

钟法权《脸谱》：

奇妙的脸谱

□周大新

谓祸兮福兮相转换。《生命恙》中患者老马和李标的父亲这两个人物，其命运也令人叹息。李标的父亲入院前病情严重，起死回生后却因一口痰而溘然长逝；老马肠癌切除看似一切顺利，未料一波三折，又重新入院，在生死边缘再走了一趟，最后因祸得福，远离官场恶性竞争，在赢得生命回归的同时，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解剖楼》中的邹锋，在鬼门关幸运地被解剖专家捡了回来，成为解剖专家的养子，命运由此改变，后“子承父业”，事业有成，却因对尸体解剖过度痴迷，又将自己的人生命运推向另一个极致。《上帝的眼睛》中的王丽，出生时因面部缺陷而遭遗弃，被好心的王二楞捡回家里，不幸命运起起伏伏，最终遇好心的医生群体而出现人生逆转。在这部书的其他作品中，也大都写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多舛，让人读后对人的命运顿生感叹。小说家写人物，只写人物的离合故事，是一个层级；能写人物的日常生活，又是一个层级；会写人物的命运流转，则又是一个层级了。钟法权已进入这个层级，令人为他高兴。小说的叙述方式是考验小说家艺术创造能力的重要方面。钟法权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他明白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得到读者的喜爱，既要依赖故事本身所谓的新意，还要有新的叙述方式，既要想好“写什么”，还要在“怎么写”上下功夫。在本书收录的作品中，他不愿意照别人用过的叙述法子，努力去进行有难度的创新。在叙述视角上，他不断变化；在结构形态上，他力求不同；在语言韵味上，他多样尝试。从而使作品的内在张力增加，可读性增强，陌生感强化，令读者读后能获得更多的阅读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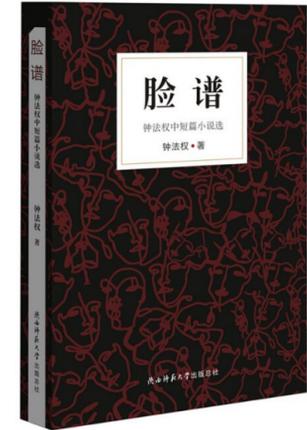
一切成功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钟法权要想使自己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行远致精，还需要不断求新求变，像川剧中演员变脸那样，不断变出新的具有艺术魅力的“脸谱”。我想，钟法权凭借他的那一股韧劲和对艺术的挚爱，会有实现梦想的那一天。我知道他虽居官场，却不因身有官职而自乐满足，总是挤出一切有限的时间去读书创作，他是用别人打牌娱乐的时间挑灯熬夜写出了一部部好作品。他在文学道路上最终能获得多大的成功我无法预言，但我深信，播下的种子终会有收获，幸运会不负有恒心之人，他日后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中国散文诗从1918年5月北大教授刘半农的《晓》在《新青年》上发表算起，诞生至今已有98年了，有人把它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以前30年为探索期，新中国成立后到1984年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35年为觉醒期，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以后到2006年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这22年为成长发展期，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之后才进入成熟期。这种分法未尝不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散文诗纯属作家的业余爱好，而没有专门写散文诗的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柯蓝、郭风都主攻散文诗，集中精力写出了许多精美的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柯蓝的《早霞短笛》、郭风的《叶笛集》出版，两只悠雅的笛声，吹出了人们的心曲，呼唤中国散文诗醒来，迎接时代的春天。但这只是起步，写散文诗的人依然只是散兵游勇。1984年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成立，像一轮初升的太阳，给中国散文诗组织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散文诗作家有了自己的归宿，不再是流浪儿。柯蓝、郭风举起两面大旗，引领中国散文诗迈步前进。有史以来第一张《散文诗报》也在这个时期横空出世，短短一年多时间，会员人数就发展到800多人。但是好景不长，《散文诗报》出了49期，因客观原因停刊，给散文诗天空吹来一片乌云，散文诗发展的高潮骤然冷却，前途迷雾茫茫。我和柯蓝四处奔走求助说情，均无结果。迫不得已，又在北京重新办起《中国散文诗报》试刊号，想起死回生，另起炉灶。竭尽全力，却事与愿违。《中国散文诗报》办了三期，仍然弄不到正式刊号，只好停办。于是1991年冬我便从北京返回四川，积极筹办《散文诗世界》。几经努力，终于得到四川民族出版社支持，以丛书形式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公开发行。中国散文诗又迎来了春天。

中国散文诗 在风雨中前进

□海梦

回首往昔，中国散文诗走过的坎坷岁月，苦乐并存。1986年4月四川乐山诗会，也是中国散文诗第二周年会，是中国散文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会后，全国许多省市成立了散文诗分会，中国散文诗学会四川分会也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了唐大同任会长，我和陈犀任副会长。其他各省市也纷纷成立了分会，散文诗的天空阴霾满天，许多报刊开辟了散文诗专栏，百花丛中散文诗鲜花怒放。在这个时期，《散文诗报》在广州创刊，对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和培养散文诗作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耿林莽、李耕、许淇、徐成森、许敏歧、邹岳汉、丁芒、刘虔、秦梦鹰、钟声扬、陈慧瑛、陈志泽、田景丰、王幅明、韩嘉川等都是当年最活跃的作者。《散文诗报》总部设在《广州日报》社，珠海成立编辑部，我在四川成都成立西南分部，负责西南地区的发行工作。那时候只有我和杏子两个人，报纸出版后从广州寄来，我和杏子按总部提供



我认识钟法权20多年了，为他第一本小说集《行走的声音》写序也有10多年了，那时钟法权还在总后勤部一个油料仓库当政治处主任。之后，不管职务怎么变化，他在文学创作上一直没有停步，坚持着业余创作，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其中《陈独秀江津晚歌》在文坛引起过很大反响。这部名为《脸谱》的中短篇小说选，近日由陕西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近3年的创作集锦。

钟法权一直牢记着“生活是创作源泉”的箴言，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当下五彩缤纷的军营生活里。这些年他的工作单位和岗位不断变化，每到一个新单位，每换一个新岗位，他都贪婪地从新生活里汲取新营养，并不断地对具象的生活进行思考，进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新发现。这部集子里他所写的医生与患者的系列作品，就是他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在此基础上的新创造。书中的中篇小说《脸谱》《生命恙》《解剖楼》和《上帝的眼睛》等篇什，就像一幅幅怒放的生命图腾，所写的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医患矛盾和纠纷，而是医者仁心背后的极致求索，是患者对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这些作品与他10多年前的小说相比，艺术质地已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内里不仅有着精彩的故事、跌宕的情节和鲜明生动的人物，而且有着浓烈的军营文化氛围，有着独特的精神风貌。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都特别注重写人物的命运。中篇小说《脸谱》中的换脸者黎明珠，被熊抓脸毁容而遭厄运，命运绝处遇到医术高超的整形专家郭兴而渐脱命运不幸的苦海，但他最终因自己的任性而将自己的命运推向了生命的终结，正可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您一个想象的人，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的确，探寻自我之谜是小说最本质的维度之一。袁亚鸣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探索自我之谜的难能可贵的小说家。苏童曾谈及对他的小说的观感，“我觉得袁亚鸣的小说似乎不同于一般的财经类型小说，他一直在探索金融邪恶的诗意，并且借助于一个个‘赚大钱’的故事，对欲望刨根问底，努力地挖掘人性的深度。”正是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使得袁亚鸣的财经小说崛起为当今中国文坛风景独特的行业小说。

《脸谱》就把当前国人的自我迷失之谜写得极为惨烈，令人过目难忘。从表面上看，该小说围绕着赵部长和应荣富的黄金期货战争展开，里面有多惊心动魄的博弈，有不动声色的阴谋、报仇、暗杀，有桃红色的卖色相、移情别恋等，但是袁亚鸣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当今世俗化大潮里国人的自我迷失的悲剧。小说人物如双奎、为农、应荣富等都是被欲望蛊惑的人，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异化之人。对于双奎而言，应荣富是模仿、觊觎的对象；对于为农而言，双奎则是他模仿、觊觎的对象。他们触摸不到真实的自我，总是渴望进入别人的生命中，就像鬼魂试图附体活人一样觊觎他人的存在。最终，他们都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里，袁亚鸣写出了30余年来中国人的自我建构模式的悲剧性本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里，人的自我建构模式被阶级、国家、革命等宏大词语所挟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世俗化浪潮重启，社会流动性大增，实利主义价值观成为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人们追求金钱、权力，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人与人的自我认同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中。这就

袁亚鸣近年中篇小说评析

□汪树东

商战搏杀中的自我迷失

所谓错位，是政治和商业的错位，是像政协秘书长俞申这样的官员把政治当成了生意，而像建坤这样的商人又把生意投向了政治的错位。但真正的错位还是当事人自我的错位。《错位》写的就是中国人不能安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悲剧。秋秋莫名其妙地要嫁给银行行长，建坤则试图迎合她的需要去收购美国银行，都是虚荣造成的，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可悲表现。他们的人生都是表演给他人观看的空虚人生。

而在《点红》中，自我迷失的悲剧就更为凄厉。小说主人公刀美兰出生于底层，从小生活不幸，长大后性格怪异，信奉“抢”的人生哲学：“她明白过来了，这就是个抢的世界。在抢的世界里，鬼不会帮她。她对着厕所间吐口痰，然后走上了去幸店当服务员的道路。正是在离开老家的路上，她在心里种下了抢的种子。在这个抢的世界里，谁能抢，谁就能拥有世界。善与恶，是没有人来评判，评判了也没用的。因而日后她事事抢在了陈兰前面。”这种不问善恶、只相信实力和抢夺的人生哲学，无疑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其实像银行行长、副市长郭欣、余小平乃至陈兰等人，也无不奉行这种人生哲学。而这种人生哲学的底子，还是自我建构的模式问题。对于刀美兰这样的人而言，她没有真实自我，她要追求的她就是他人的承认和羡慕。她不要手海地抢走陈兰的男朋友余小平，最后杀死女儿，告发郭欣和陈兰，为的就是要压倒别人，超越别人。因此《点红》的标题就耐人寻味，无论是小孩子额头上的点红，还是包子心上的点红，都只不过是添加颜色，引人注目。而刀美兰最后临死前还想着让陈兰帮她点红，写出的恰恰是这个生命终生寻求的就是他人眼中的空虚自我。生命中所有真实的价值被放逐，虚幻的“点红”自我被视为真实，价值颠倒之荒诞，莫此为甚。

袁亚鸣在《会唱歌的树叶》中则是通过柳洁和郭欣的悲剧人生来展示人性异化的困境的。表面上看，作为期货

公司总裁的郭欣事业成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内心孤独无助、脆弱不堪的苦闷之人，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空虚之人。而柳洁，表面上看时尚靓丽，业务干练，精明能干，能够赢得总裁郭欣的青睐，还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但其实也是一个心有不甘的人，是一个迷失在欲望浪潮中的人，为了报复郭欣，她连亲生孩子都可以送到寺庙去。小说中反复写到柳洁感到自己就像一条失去内脏的鱼，象征的也就是像柳洁、郭欣这样外表光洁但丧失了真实自我的人生困境。

非常有意味的是，袁亚鸣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死亡和暴力为结局，这也是摹仿性欲望造成的可怕结局。《脸谱》中的为农总想置双奎于死地；双奎杀死了应荣富后，也威胁为农。《错位》中秋秋剪掉吴敏黎的舌头，刺伤自己。《点红》中刀美兰杀死女儿，告发陈兰和她的情人纪委委书记郭欣。《会唱歌的树叶》中，小说写到郭欣做期货失败，接受柳洁的帮助，就像挥刀自残一样。其实，这些人总是在攀比、摹仿中建构自我，总以为他人才是罪魁祸首，当目的无法达到时，他们就迁怒于人，于是或杀人或自残，表现得愚蠢而丑陋。

从《脸谱》等中篇小说看来，袁亚鸣真正关注的就是当前中国人以摹仿性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建构模式的复杂戏剧。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一书中就认为真正伟大的小说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被称为形而上欲望的摹仿性欲望，例如塞万提斯、阿汤达、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都是探索摹仿性欲望的杰出小说家。而袁亚鸣也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卓越素质，他以极富艺术韵味的先锋叙事剥开了世俗化时代华丽虚浮的装饰外衣，进入了现代人性性的晦暗不明之域，勇敢地探索着现代人自我迷失之谜，大胆地突破了行业小说的题材束缚，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性维度。这无疑是值得批评家和读者殷切关注的。

用实诚书写生活的本真

□李明春

写作需要心静，来不得半点浮躁。但心静不是心禁。我持开放的心态，从来认为写作不能自娱自乐，需要交流来催生和容纳作品。《半罐局长》在我心中折腾了10多年，与文友们交流了10多年。动笔后，每写一章就呈报给文友们审批。三稿后，省、市作协分别为其组织改稿会，只说丑话，谢绝好话，学乡下人带孩子，说得越丑，长得越好。改稿会后，又经过四次大改动，增删字数近10万。作品能以现在的面目问世，实在有赖于那些丑话。我在此对说丑话的朋友们一并谢过。

说来自己当了13年的教育局长，也就干了一件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普九”）。一路走来，积攒了不少感慨，想把它变成小说，给后人留下一个文学标本。不是自己的经历有多大写头，而是普九这件事实在是值得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把“幼有所学”作为理想。当今的教育部长更是说：“中国的“普九”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么一个值得写、至今仍鲜有作家涉猎的题材，我又熟悉，因此我的写作冲动中就有了写它没商量过的感觉。

小说言小，再大的题材还得从细微处着笔。过去写教育多从校长、老师、学生、办学者的角度落墨。我选择了县教育局长。有角度独特的考虑，但不单是这个因素。“普九”是以县为实施单元，规划、部署、验收都以县为单位，这又是一个吻合。自己有当局长实施“普九”的经历，本色写作不易走样。关键是“普九”中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受到上下左右的挤压，如危房、师资、工资、规划等等，只有县教育局长这个角色，才能全面触及、感受、作为。如中国“普九”中最大一个秘密，是从上到下，从布置到验收，只讲“普九”不讲“义务”，导致乱象丛生。财政预收不足，政府行为不到位，该收的教育附加经费不收，不该有的学生收费普遍乱收，这种现象只有县教育局长这个角度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作品才会有全面、真实、生动的文学呈现。

有句名言叫“选材要严，发掘要深”。这个“材”，我觉得既是题材，也指素材。

了，他们首先通不过。若想留给后人看，更不能糊弄。对脑海中的素材过滤、剪裁时，我自个儿立了个规矩，虽然写的是一个县的“普九”，但笔下的人和事，应是普九中普遍存在的。不带普遍性的，再惊险曲折也不选。《半罐局长》中的情节，无论怎样离奇诡异，都是“普九”当铺在“宕县”确实发生，在其他县也时有发生的事。

人物塑造上注重性格转化，是专家们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把人物的言行直观地表达出来，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写小说的基本要求。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揭示人物言行的内在动力和缘由。过去我认为走到这一步就足够了。专家学者指出还有转变。惟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才见真性情。正如两个死敌殊死决斗后，要为死去的对方举行厚葬，较之叙述厮杀和描写仇恨心理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教育管理者过去叫官僚，理应是儒雅的形象。让一个教育局长浑身“匪气”，有悖常理。这种反常搁在教育事业发展长期滞后、教育理念陈旧、教育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历史背景下，就更正常不过了。把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人物，写得人情入理，没让读者记忆中，我认为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性格的变化起了作用。

由于主人公的局长身份，想不写官场都难。把控不住，小说就会让浓浓的官味遮蔽了“普九”的小身位。我在写作中努力同官场小身份区别开来，即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尽量与权力争夺切割。人物塑造上不作大忠大奸的设计。《半罐局长》中的官场生态，同眼下贪腐风气比较，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有割不断的因果联系。文中一个小学教导主任因接受2000元的礼金内疚自杀，是来自“宕县”的一个真实案例。写出来不仅是为了真实，也有我对那时人们做风纪的社会心态的一种怀念。

既是教育题材，就无法绕开“应试教育”这个话题。作品中说校长局长们“辛辛苦苦地祸国殃民”，来自当年一位国务院教育顾问的真实讲话。中国的教育至今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从上到下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又还离不开高考。这种尴尬无奈，带给社会对教育的许多误判误导，

席、副主席，组成了主席团理事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广东、河南、湖南、内蒙、新疆、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等28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的代表100多人参加，全票选举通过我为主席，张诗剑、夏马为海外分会主席。同时选出14个副主席，廖月为副主席兼秘书长。

从1984年中国散文诗学会成立，到2006年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中国散文诗的领导班只举行过三次正规选举。第一次是在1986年乐山诗会上选举了柯蓝、郭风为主席，唐大同、丁芒、耿林莽为副主席。第二次是1990年9月19—26日山西朔州年会的选举。这次会议选举完善了中国散文诗学会的组织机构，通过了学会章程。艾青、冰心、郭风为名誉主席，柯蓝为名誉主席，同时选出12名副主席，即丁芒、李耕、许敏歧、旭宇、杨子敏、林非、秋原、钟声扬、耿林莽、唐大同、海梦、蔡虹。第三次正规选举就是2006年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在双流毛家湾举行选举。

中外散文诗学会成立后，中国散文诗发展掀起了新的高潮，广东率先成立分会，接着深圳、新疆、上海、德阳、四川、珠海等7个地区成立了分会。散文诗创作基地也纷纷在全国各地建立。三星堆创作基地、海南南丽湖创作基地是最早建立的。接着就有四川长宁竹海创作基地、珠海横琴岛创作基地、新疆可克拉达创作基地、阿坝州的金川创作基地、山西大禹渡创作基地、人祖山创作基地和菲律宾创作基地。这些创作基地，将是散文诗作家的创作平台，为散文诗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归纳起来中外散文诗学会目前拥有7个分会10个创作基地8000多会员（包括各分会在内）。这支浩浩荡荡的散文诗大军，正引领着中国散文诗向新世纪高峰迈进。

包括文中县上领导对教育局长人选的内行外行之争，就是这种误判误导的表现。我把内行和外行搁在“应试教育”面前检验，因此区别于“文革”中不尊重知识的外行领导内行，使主人公令狐阳这个外行具有了比内行更内行的内涵。

在《半罐局长》写作中，摒弃语言是叙述故事的工具的旧观点。再不认为只要故事好，怎样叙述都行。语言不抓人，人们看不下去。内容再好，读者也无法企及。写《半罐局长》时，我对语言表达做了一些尝试。如时时注意对方言的掌控。方言是文学味最浓的语言，尤其是四川方言。运用得当会让作品增色不少。但太浓，就如小菜太辣了，会让受众面骤减。四川的方言走出去，方言是一大制约。对方言的使用，只要字面不产生歧义，没有理解困难，就尽量使用。如“晓得”和“知道”，我选用“晓得”。反之如“结束”和“刹角”“么台”，我会用“结束”。

《半罐局长》写到后来，我竟有了语言陌生化的追求。有时用几天的时间来打磨一句话，同样的意思，就想说个与别人不一样。此前的几部作品写作，结构让我伤透了脑筋。翻书看，听人说，越弄越乱。《半罐局长》下笔前，我在心中画了一个结构图，以“普九”为主线，爱情、官场角斗为辅线，像钢缆一样绞在一起，互为因果，交替推进。

回想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没有结构的观念，一个故事讲完，再来一个故事，被人戏称为珍珠项链式。现在看来，这种结构整体性差。好的小说结构应该围绕冲突组织情节，整部书浑然一体，抽掉任意一个章节，全书就会坍塌。《半罐局长》有这个架子了。

不知谁说过，作品成功与否在于细节。细节的设计和描写是颇费精力的。有时一个细节的设计要花很多时间。对学校破烂状况的描写，已被人写尽了。我不想再在《半罐局长》写作中重复别人。想了好久，终于在第五稿时有了一个想法，以主人公令狐阳回到母校检查时，看到他当年读书时的那个耗子洞还在，还有耗子出没，借这个细节揭示教育设施建设几十年不变的滞后状况。为这个细节的获得，自己高兴了好几天。